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八期 ——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6d)

【本刊专稿】	施义之之冤与李震之死——《血与火的历练》读后	余汝信
【史海钩沉】	《中学文革报》名扬全国始末	阎志峰
【书刊评论】	《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得失谈	丁凯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施义之之冤与李震之死
——《血与火的历练》读后

• 余汝信 •

陆军第21军在奉命介入文革，参与“三支两军”之后，军领导中出了几位“名人”——军长胡炜，文革中历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已上报因部队调防中央未批）、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副军长、继任军长刘江亭，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副组长；军政委施义之，国务院公安部政治部主任、部业务领导小组成员、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继任政委刘建功，国务院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局长。前三人在文革后均可谓历尽坎坷，其中，又以施义之后来的处境最为凄苦，命运最令人唏嘘不已。

施义之（1917—1995），江苏武进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历任新四军十一旅锄奸科长、组织科长，华中野战军九纵政治部组织科长，团副政委、政委，三野21军6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60年7月，升任21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4月任军副政委，1965年5月任军政委。对这位军中老资格的政治工作者，老搭档胡炜评其曰：“为人正正直直，坦坦荡荡，老老实实”。〔1〕

1966年8月，北京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开会期间，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到施住

处，告之曰：“中央要北京军区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长级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讨论决定让你去”。施起初多番推却，但经不起吴岱再三动员，遂答应“服从组织决定”。12月下旬，北京军区通知施立即赴京到公安部报到。不料施这一“服从组织决定”，也就从此决定了自己下半生的不幸。

到公安部十年后的1977年5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翌年7月，被令到秦城“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将对他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签发，称施有在“清查公安部档案”、“伪党案”事件中，参与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给“四人帮”报送材料等五大罪状。延至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批复，施义之四十七年的党籍、军籍被开除，每月发予生活费150元。胡炜为此评之曰：“义之同志晚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家都知道这是某部领导人挟嫌报复、某领导偏听偏信造成的，都为他抱不平”。〔2〕

施义之夫人陈枫，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一位在举世昏昏的毛时代坚持独立探索的思想者”的当代知名学者顾准（1915—1974）的妹妹（顾准从母姓）。对于施义之和顾准的关系，近年知识界中人著文多有微词，实为不了解当时情势不体谅当事人当时处境所致。顾准的儿女们后来的回忆则较为公允：“1966年底，姑父奉命离开部队到公安部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父亲已于1965年被第二次划为右派（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起因是‘四清’试点，然后被隔离和劳改，劳改地点在北京郊区房山周口店。父母已经商量过离婚的事情，父亲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在这种情况下，姑父姑姑仍然一如既往关心着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1967年姑姑带全家从山西搬来北京，随即邀请母亲去他们家做客，母亲此时精神状态很不好，还在祖母面前强打起精神露出微笑。姑父当时在公安部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但仍然不忘抽空来看望我们和母亲。1968年春天，姑父到过我们在百万庄的家，竟然成为了与我们的母亲见过的最后一面，他是亲戚中唯一最后见过母亲的人”。〔3〕

顾准的儿女们再回忆道：

“1968年4月8日，母亲终于没有能挺过‘文革’风暴的摧残，离我们而去。我们在绝望中，在邻居众目睽睽之下处理完了母亲的后事，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住在公安部大院里的姑父。次日姑父接到这封信，立即打来电话，是通过我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找到我们的。我们对他说今后不方便再去你那儿了，他回答说：‘来就是了，马上来，你们都来！’语音中掩饰不住痛心和关切。他那天卧病在家，老三高粱先去了，姑姑几天之后从外地回来，两人抽空约我们到中山公园，这是我们妈妈去世以后第一次与亲人在一起。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时刻，姑父又是在最敏感的要害部门‘支左’。在我们遭遇家庭惨变，父亲当了‘极右分子’离开家，母亲‘自绝于党和人民’，我们也彻底成了‘黑五类’的时刻，我们的姑父和姑姑对我们的关心没有丝毫犹豫。记得在中山公园，姑夫和姑姑一个个和我们谈话，叮嘱我们要坚强，要振作，唯恐哪一个孩子想不开出事。他们郑重地要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去他们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此后，1968年秋，高粱和重之兄弟俩同去内蒙插队，1969年大姐结婚，1970年逸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此前妹妹秀林已经在1967年到了黑龙江兵团。我们百万庄的房子，也被另一家占用，家对我们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就剩下了一个地方可当作‘家’看待，那就是姑父和姑姑向我们敞开了大门的那个家。从此，姑父和姑姑的家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相聚相见、休假养病的可靠后方，直到文革结束。

“姑父一到公安部就向部领导说明了他和‘五哥五嫂’一家的关系。他十分清楚，他在公安部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什么，但这没有影响他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在公安部前部长李震突然死亡列为大案的时候，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公安部成为政治风暴中心的时刻，在他工作特殊艰难的阶段，他都没有因为要避嫌而对我们有丝毫冷落。”

“在如同海啸一般的文化革命的十年中，我们家庭在经历了‘覆巢’之变的时候，兄弟姐妹中有四个还在青少年时代。在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和指点，在对人生从无知走向成熟的途中，我们得到了姑父和姑姑的全力的爱护。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处在那个不稳定的年龄，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时一言不慎，一念之差就可以断送一个年轻人，从前途甚至到生命。有多少类似家庭的孩子受到无情的摧残，有的就此沉沦。我们能够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正常地成长，今天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这其中有很多很多要归功于姑父和姑姑的呵护。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有个一年一度在自己家一样的‘安全港湾’放松一下的地方，那里有爱你和随时抚慰你的亲人，它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4〕

顾准的儿女们最后写道：

“有一种评论，认为姑父和父亲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一个是‘独立思考的典型，一个是盲从主流政治的典型’。如果从表面看，把时间定格在1974年，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从历史的角度，从人格、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角度审视，在我们的心中，姑父和父亲是在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中起来奋斗的老一代革命者中间最优秀的两类代表。父亲是知识者，他有思考的大智大勇。姑父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胜利后的年月永不改一个人民勤务员和普通人的本色。保持良知者不会随波逐流，很不幸，姑父和父亲两人都成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年了。我们经常在想，反右和文革的悲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假如一个人像父亲遭遇的，因为对于社会问题或者科学问题的思考与主流意识相左，就可以被他的国家剥夺普通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无数屈辱的对待；或者假如一个人如姑父遭遇的，在公务的任命上，不允许个人有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而事后又要被迫承担由于全局性的错误的惩罚，遭受对他的人格和信念的曲解和贬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进步将会非常困难，而最优秀最正直最有崇高追求的那些社会成员往往最容易被摧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很阅历，我们痛切地认识到，尊重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个人权利，宽容不同的甚至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意见，是我们国家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发展的试金石。”

“简单化的思维是理解和宽容的大敌。一些写顾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维方式提炼顾准，为了衬托英雄，就需要对立面，这样难免通过发挥想像来勾画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这就缺少了实事求是和历史分析的态度。姑父施义之平静地面对了对他的曲解，这增添了我们对他的敬重。我们希望人们用真正的顾准精神来读顾准，写顾准。在这方面，姑父施义之的良知的榜样是有教益的。”〔5〕

1995年10月29日，施义之因前一天应邀到京郊怀柔参加21军老同志的一个聚会，过于疲惫，引致腹部血管瘤破裂出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其后，陈枫即正式向公安部及有关部门作了报告。公安部说，施不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过问此事，其他部门也只表示研究再说，没有明确答复。胡炜得知噩耗，和21军的老人们商量：此事不宜久拖，官不办就自己办。

告别仪式定于当年11月11日上午举行。讣告发出后，陆军第21集团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第二干休所还是派出了人员进行了会务协助。华国锋收到讣告后，还是让秘书打来了电话，转达了华的哀悼。施义之的老领导谭友林、孔石泉，邓子恢的夫人陈兰，滕海清的夫人王彬，

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原政委傅崇碧，施的老战友胡炜、梁济民、刘光甫、李宣化、沙风等及在京的一大批施的老部下共四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施义之逝世十年后的2005年10月，由陈枫主编的《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出版。内中刊载了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的回忆摘录——“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披露了文革十年期间施在公安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内情，殊为珍贵。

如关于“砸烂公检法”口号的扩散经过，施回忆道：

“1966年底我到公安部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但听到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〇’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

“‘七·二〇’事件后，7月22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

“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他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七·二〇’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谢富治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这就说明，“砸烂公检法”其实也就是“最高指示”。由于这句影响甚巨，在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的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争议颇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7）

其实毛泽东也是为自己打圆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与“砸烂公检法”哪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回忆录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李震事件。从施的回忆中可以得知，“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是周恩来本人的推断，往此一方向查案，是周恩来本人的意见，将于桑、刘复之“保护审查”，发动公安部的干部揭发于、刘也是周恩来的决定。文革结束后，将这些“罪责”都推到施义之等执行者身上，是十分不公平的。

为使更多的读者能了解李震一案的来龙去脉，笔者将施义之回忆录中“李震之死”一段附于文后，同时对文中涉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适当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那一个特殊的年代。

当然，我们也期望能见到不同立场或意见的材料，如于桑、刘复之对此一过程的回忆，以期通过比较，可以更准确地更客观地对此一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于施义之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陈枫的疑问，也许就是类似笔者这样的众多晚辈的疑问：

“你应该承担这些罪名吗？你有资格负这些责任吗？代人受过或强压在头上的罪过并不能掩盖历史真相。当初你是谢富治、李震部长领导下的党组一般成员，在李震去世后，你负责部核心小组工作，也是在华国锋兼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从1966年底到公安部十年来，你都是在部长的安排、要求下，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交代给你的各项工作任务，而且对自己执行的错误已作了深刻检查。为什么一生对党忠贞不渝换来如此无情的打击！”（8）

我们坚信，事实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对施义之以及李震的一生，历史也必然会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正确结论。（2006年5月）

注释：

（1）（2）胡炜：《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施义之同志》，见《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页85—87。

（3）（4）（5）顾淑林、顾逸东、顾南九、顾秀林、顾重之：《怀念姑父》《血与火的历练》，页382—392。

（6）（7）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摘录：《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见《血与火的历练》，页41，47。

（8）陈枫：《风雨同舟五十年》，见《血与火的历练》，页433。华国锋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附：

李震之死

• 施义之口述 • 陈枫整理 •

“九·一三”事件前后，中央从地方调来不少干部参与决策。有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被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吴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是李震、张其瑞。在“十大”会上李震、于桑被选为中央委员。自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期间，李震即代部长工作，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任部长。（余注：李震自1970年6月即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张其瑞，原公安十一局一般干部，1970年6月起任部核心小组成员；于桑，原公安部副部长，1970年6月起任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委会副主任；施义之自1970年6月起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部革委会副主任。以上详见笔者《1973：李震之死始末》。）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发生一件大事——李震的死。

关于“算旧帐”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帐’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余注：据施义之说，“算旧帐”是“批林整风”时纪登奎对公安部部分人的批评。此后，公安部由上自下产生了“算旧帐”与“反算旧帐”、实质上是如何看待文革的意见之争。李先念也曾批评“‘算旧帐’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部核心小组成员各自做自我批评。）

1973年10月20日是星期六，晚上开的核心小组会上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他就走了。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余注：曾威，1955年授少将军衔，原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67年调公安部任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5月调回部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1983年9月离休，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钟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我没当回事，心想可能有事出去了，半夜被召到国务院开会是有常有的事。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谢富治夫人，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余注：刘复之，广东梅县人，1937年11月参加中共革命，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革前为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黄庆熙，文革前为内务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2年1月任公安部副部长。）

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8341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余注：杨德中时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警卫局改称）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其任中办副主任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至1994年；刘传新，原陆军第27军副政委，1967年2月起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受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23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当时吴忠说：据周总理的秘书讲，21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余注：郭玉峰，原陆军第64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6月始任中组部部长。）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

次才去找。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山东的案子（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枢案（苏修派遣特务）。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我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8341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在这个严重时刻，当着众多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还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周总理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个政治局委员（记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紧张，周总理就没有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我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提纲经华国锋审定，下午3点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我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我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我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

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入。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我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十多人，要我们隔离审查。我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请示周总理后再说。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我，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28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列为特嫌）和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我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玉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姚伦（原预审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十一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余注：此处关于刘冰清的记忆应有误，1970年6月后设立国务院办公厅，撤销国务院秘书厅，办公室未设行政负责人职务，由中共核心小组负责。苏玉涵，应为苏宇涵，文革前为公安部十三局（预审局）局长。）

11月上旬，吴忠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周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我意识到党中央对李震的死是从国际这个大背景来考虑的，所以要我们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把李震的死和国际反动势力连在一起，感到触目惊心，工作上压力很大。但有周总理坐镇指挥，又有华国锋的直接领导，我全力配合破案组工作，有事可直接汇报，心中有了底。

11月14日华国锋对我说：“中央为了加强公安部的领导，已决定调杨贵、祝家耀、徐海涛（杨是中央候补委员，原林县负责人，时任河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祝是中央委员，上海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事务管理局局长；徐是部队干部，时任总政保卫部长。他们作为接班人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部里也可以选人参加核心小组，不成熟的话，可以临时参加或列席会议。”还说：“总理指示重点审查对象是郑爱萍，至少动员千人以上大会揭发批判，除查破对他们的疑点外，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从现场看是自杀的样子，但分析没有自杀的因素，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吴忠去天津发现刘复之与王万沐的关系，问题就更复杂了。”还指示说：“群众揭发的线索已不少了，下步要查与于、刘搞阴谋诡计有牵连的人和事，一起揭、一起批，实际上要与两条路线斗争挂起来，这样对破案有利。但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掌握好政策。”后来在揭批过程中，出现了“上帮下促”的现象，这样把思想认识与破案线索混淆，扩大了批判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经纠正制止了。（余注：上述原书对杨、祝、徐三人的注不大准确。杨贵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林县县委书记。1973年11月至1979年7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河南省委常委，1979

年7月后任五机部渤海农场副场长，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工人，文革中参加上海“工总司”，后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6月至1984年6月隔离审查，1994年赴美国定居；徐海涛，原上海警备区警备师政委，时任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罗青长（中央调查部长）、刘湘屏（卫生部长），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张其瑞回来把破案组在检查刘复之的文件时，查到的一份公安部局、处领导班子配备名单交到核心小组。这份名单上有李阳及其他七、八名曾含冤入狱的局级干部。经核心小组大家讨论认定，李阳是1972年获释恢复工作后不久因病去世的，他去世前，名单上的几名局级干部尚未出狱。推论这不是核心小组商定的公安部局级领导班子配备名单，而是刘复之自己确定的名单。随即向华国锋和破案组汇报，华国锋要我们写成简报报中央。核心小组在简报中，上纲到“翻案”，“复辟夺权”。（余注：李阳，似应为李祥，文革前为公安部七局局长。）

关于“算旧帐”的情况，虽然已口头向周总理汇报过了，但纪登奎要我们写个书面报告。因为文革中核心小组会一直没有正式记录，就在核心小组会上根据每个人的记录和回忆相互补充写了个书面报告报中央，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报告上没有说明这是根据核心小组成员个人记录和共同的回忆汇集的。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听取了祝家耀发动群众的综合汇报。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华国锋在会上嘱咐我们，这些指示由核心小组掌握，暂不向下传达，以免松劲，工作仍照常进行。（余注：明朝三大疑案，指发生在明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梃击案，泰昌元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均与明光宗朱常洛有关，反映了明末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充斥着激烈的明争暗斗。三大案均未能深究，尤其前两案更不了了之。）

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具体的内容记不起了）。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经华国锋批准后，召开了大组长和处以上干部会议，由杨贵按两种可能作了传达，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工作中的责任。

1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站得高，看的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说给一周时间。同时华国锋指示我和吴忠一起去接于桑出来。还指示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为了给公安部做善后工作的时间，会上决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中组部招待所住几天再回家。

会后华国锋要我随他一同去人大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车上华国锋对我讲：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当时从被害的角度审查是必要的。向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是这样讲的。周总理指示，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时间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批判他，一是挽救

本人，二是教育大家，提高思想。华国锋写的解除于桑保护审查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于桑与李震的死无关，但于桑在公安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回公安部后要接受群众的批判，自己要作认真的检查。第二天，我同吴忠拿着周总理批准的报告给于桑看了，把于桑接到中组部招待所。后来于桑回部作了检查，经大小会数次批判后恢复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仍为核心小组成员。（余注：于桑1974年2月解除关押。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参加“王张江姚”专案组工作，1977年8月至1982年6月任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大约在1975年5月，刘复之要我替他转给周总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卫戍区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到他住处安装窃听器。周总理批示要吴忠查。经吴忠查没有此事。华国锋让杨贵、于桑找刘复之谈谈。在一次华国锋参加的核心小组会上，杨贵、于桑汇报了同刘复之谈话的情况，会中有人说这不是对曾威个人，是对破案组的。华国锋说：“不是对破案组，实际上是对我的”。（余注：刘复之1977年12月至1980年11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1月起历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自此，李震之死的案子基本结束。

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在他领导下多年，得到过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负责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压力和思想矛盾又极少透露，我对他的内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处理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见及争执进行不下去的困难处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初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李震之死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在中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处理措施。中央领导人在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将此案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强烈倾向于认定“他杀”，这确是事实。

我当时对中央领导人的这种判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周总理在关键时刻点了我的将，要我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提出过胜任不了，但中央决定了，我只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

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当确定李震是自杀后，我实事求是的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中及时做了调整，坚决贯彻了中央领导的指示。

（节选自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摘录：《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血与火的历练》，页59—67。）

~~~~~

【史海钩沉】

《中学文革报》名扬全国始末

• 阎志峰 •

◇ 几个高中学生谈得很投机，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问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少年中首先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的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文革”中特有的文艺现象——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

《中学文革报》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并且迅速传播全国的。

1967年初的一天，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在马路上看到《出身论》，觉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北京六十五中的遇罗文。牟志京和同学王建复就去找遇罗文，他们谈得很投机，就想把这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以扩大宣传。他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

说干就干。这几位高中生迅速行动起来。王建复和牟志京从学校借出500元钱。几天之内，他们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几个人忙了几天几宿，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遇罗文、王建复和牟志京这几个高中生，又找来许多同学帮忙，包括他们的弟弟、同学，队伍里还有女生。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常常由年龄小一些的初中生来干；他们这几个高中生，接待来客、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遇罗文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遇罗文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三位高中生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他们干不可的事以后，他们还会拉上女生一起去卖报，让女生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 刊登《出身论》，《中学文革报》一炮打响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

这一期报纸的主打文章是《出身论》，像《出身论》这样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人们佩服作者出众的文笔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卖报的场面非常动人，热情的读者把几个卖报人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他们不得不规定每人限买5份。有时他们把报纸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200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

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2元钱去买原本2分一份的报纸。

《出身论》何以受到人们如此的欢迎？原来，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称为“鬼见愁”，它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成为萦绕着一大批青年人命运的噩梦。8月2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此后，更有人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条条”。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

《出身论》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写出来的。文章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200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

#### ◇ 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名副其实的主笔

写作《出身论》的人，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这一年他24岁，是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1950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岁。他生得温和、宁静，眼神充满智慧。在学习生活中，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在已出版的7期《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成了该报名副其实的主笔，但他却是一个隐名英雄。报纸每一期都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其实它的作者是遇罗克。遇罗克还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而且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XXX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

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遇罗克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鼓励弟弟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弟弟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遇罗克也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遇罗克发表的一篇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使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面。

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第一期：《出身论》；第二期：《谈“纯”》；第三期：《“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四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五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六期：《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遇罗克不分日夜地给《中学文革报》写稿，为写这些稿件，还要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与热心的读者通信，探讨更多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向戴高乐学习，每天亲自回复上百封信。他还要坚持完成自己原先制订的学习计划……尽管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时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他说：“我做了点有益于人类的事。”

#### ◇ 《中学文革报》组织万人大会批判“血统论”

《中学文革报》在北京四中设立了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这些读者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封、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

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报纸的印刷很困难，《中学文革报》社的成员们只好打算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他们不得不办下去。

在1967年一二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

在“联动”活动最高潮的时候，《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的形式，系统地剖析“联动”的起因的文章。文章用大量事实进行了对比，最后总结道：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上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画他们的形象了……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1967年2月17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中学文革报》成员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

人大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文革报》成员决定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由遇罗文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讲话。因为知道消息太晚了，遇罗克、遇罗文和郝治连夜加班起草发言稿，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他们一起念、一起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才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待到一切全忙完，天已经大亮，遇罗文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9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出身论》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使大会大大超出预定的人数。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遇罗文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遇罗文加快了念的速度，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当遇罗文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他总算松了一口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

《中学文革报》的几个成员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让人分不出字眼，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他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他们绝对招架不住，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遇罗文，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这次大会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中学文革报》也造成了轰动效应，而这正是《中学文革报》成员们的目的。

◇ “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

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批判，原来支持《中学文革报》的两三家报纸也有“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中学文革报》名声越来越大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竟是他们制造的并为他们所利用。所以在小报群剿无效后，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给《出身论》定了调子，公然宣布它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么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人，因为清楚报纸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有14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李金环、纪亚琴（气象专科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四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十三中）、张颖（女二中）。作为《中学文革报》的主笔，遇罗克也于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入狱后，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中学文革报》共发行7期，累计发行量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据此，有人说它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 《党史文苑》2005. 15

~~~~~

【书刊评论】

《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得失谈

• 丁凯文 •

明镜出版社继2004年7月出版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后，今年4月又推出了吴润生先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全书约21万余字。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内，明镜出版社就出版了两部与林彪有关的著作，在在显示出林彪这一话题在当今文革研究的史坛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探讨、研究林彪事件依然是史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热点，同时也显示出明镜出版社独到的眼光和魄力。笔者有幸在近日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吴著《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先睹为快。读罢此书，有如下体会，简要写出，就正于各位方家。笔者认为吴著就林彪与文革之关系的探讨有所成就，亦存在某些不足。

一、体裁独特

以往研究文革史或文革人物的史学家或作者，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叙述研究过程中多采取按年代顺序的方式予以展开讨论。但是吴先生在自己的新作中另辟蹊径，采用专题的方式，对文革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加以讨论，并在叙述过程中融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此种写法更能抓住重点，直奔主题，令读者在阅读中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吴先生的书分为五个大的章节，即“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林彪与江青”、“林彪与张春桥”、“林彪与‘九一三’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剧”。吴书在每一章节里又有若干小的题目，这些小题目又紧扣每一大章节的主题。例如在第一章“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内，作者探讨了林彪与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关系，其中涉及到林彪与“彭罗陆杨”的倒台、林彪“五一八讲话”、林彪如何处理“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关系、“二月逆流”与林彪的关系、“杨余傅事件”、林彪与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林彪与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的矛盾斗争。抓住了这些事件的重点与要害，就能从中梳理出毛泽东发动操纵文革运动的基本脉络，从而进一步讲清林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博采众长

林彪这位历史人物在大陆文革史研究中历来是个反派角色，无论是毛泽东当政之时还是后来邓小平掌权之际，都毫无例外地将林彪归结为“反党集团”甚或“反革命集团”，将文革浩劫的历史责任放到林彪与“四人帮”头上。1981年在邓小平一手操控下出台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将林彪定位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党史学界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将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切言行放大为“处心积虑”地要搞“篡党夺权”，且严密封锁不利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资料，严格限制学术界就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深入探讨。虽然有一些学者曾呼吁重评林彪事件，但终因人微言轻，作用不大。大陆党史界在林彪事件的研讨中依然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到海外，希望一些有识之士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于官方的观点，这就形成了海外研讨林彪事件的热点的基础。吴润生先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继《重审林彪罪案》后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先生在《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后记中说，在写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参考了有关的书籍、杂志、文章达几百上千篇，还得到一些文革史专家教授们的指导和帮助。细读全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海内外研究者在林彪事件研究成果方面的影子。比如《毛泽东致江青信》真伪辨、所谓毛泽东与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逼”走林彪、对所谓林彪搞政变的“571工程”纪要的质疑、林彪座机何以坠毁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曾经被一些专家学者反复认真探讨过，这些研究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都有详尽的分析。

举例来说，《毛泽东致江青信》真伪辨一事，最早在前几年香港的“争鸣”杂志上就有披露，声称毛信是在林彪事件后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地位，由康生、张春桥等人执笔伪造而来，随后周恩来再公开为此信背书，成为揭批林彪反党罪证的一个武器。香港的冯治军先生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也论证了此信乃系伪造。陈小雅女士在其《毛泽东〈给江青一封信〉真伪辨》一文中再次予以剖析（此文见《重审林彪罪案》）。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探讨，最早由王年一教授与何蜀先生撰文《“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予以分析（该文最早见于1999年《吉林农业增刊》，2004年收入《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为了达到倒林的目的，使尽手段将林彪“逼”上了绝路。王年一教授在1996年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913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2003年5月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作者高文谦同样指出毛泽东“把林彪逼上绝路”。王年一、何蜀与陈昭先生在《“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毛泽东“使尽手段把林彪逼上绝路”（该文见《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对于林彪是否参与了所谓的“杀毛政变”一事，林彪事件研究学者陈晓宁先生撰文《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详尽有力地论证了所谓林彪主谋指使林立果杀毛一事不能成立。大陆研究林彪事件的军旅作家张聂尔同样在《风云九一三》一书中予以充分讨论，笔者亦曾撰文《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和《林彪事件几点问题再辨析之二》，对所谓林彪参与“政变杀毛”一事予以辨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一书）。至于林彪的座机为何坠毁，陈晓宁在2002年就曾撰文《质疑林彪出走事件》，论证了林彪座机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导弹攻击所致等等。这些都是这几年来，围绕林彪事件出现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无疑为后人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吴润生先生在撰写《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时充分参阅了以上笔者提到的文章和著述，在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吴先生能够充分吸收并加以综合运用。比如吴先生在“‘设国家主席’刍议”一节中，就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分析了林彪是否想就党国家主席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吴著从“法理”、“主张”、“阴谋”三方面予以探讨，指出“一、第一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人不是林彪；二、在公开场合坚持设国家主席意见最多的人也不是林彪；三、林彪的主张完全符合法理和国际惯例；四、林彪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边。”在“中央政治局中，除毛泽东外，没有人认为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就是分裂党，就是夺毛泽东的大权。”吴先生这段分析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吴先生

下面还应有一句话应说而未说，即所谓的“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实乃毛泽东的欲加之罪，纯属整人借口。当然，这句话是笔者从吴先生的分析进一步引伸而出，如有不妥，还请吴先生及时指出。

还举一例，官方以往的说法是，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误信了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从而在文革之初即将罗打倒。吴著指出虽然罗瑞卿并不反对毛泽东，但由于“罗瑞卿客观上站到了刘少奇一边，成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所以，“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最终打倒刘少奇必须施行的第一步策略。”由此而来，“林彪也好，叶群也好，‘突然袭击’也好，‘死无对证’也好，任何‘检举揭发’，甚至‘造谣诬蔑’罗瑞卿，都会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这就一语道破了毛泽东的天机，凡是对开展文革有妨碍作用的人都必须搬开，特别是毛泽东要绝对保证军队掌握在自己信任的人手中。由此读者不难明白，为何林彪在1971年倒台后，罗瑞卿仍然不能被解放，因为真正要打倒罗瑞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

再举一例。以往大陆的党史界将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与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的斗争曲解为林彪与江青互相勾结又矛盾重重，也就是所谓林江二人“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后因分赃不均而反目成仇”，这种简单化的分析从本质上讲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将原本丰富的历史过程单一化，从而为官方的一家之言服务。吴著详细地分析了林彪与张春桥之间矛盾的来龙去脉，指出林张之间“主要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吴著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路线需要张春桥，张春桥是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最适宜最得力最忠实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称其为毛泽东晚年的‘第一干将’并不为过”。那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就意味着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否定。吴著认为“其实林彪和毛泽东的最后斗争，真正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誓死打倒张春桥，以彻底改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毛泽东则坚决保护张春桥，以捍卫自己的‘文革’路线。”这就是林彪之所以倒台的根本原因。吴著的这一分析显然更符合贴切历史真实。

三、有所成就

笔者这里所说的“有所成就”是针对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整体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在2004年出版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但是该书的重点是研究“九一三事件”，而非整体探讨林彪与文革的关系。而吴先生这本《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推进。

笔者认为吴著较有新意和价值的是该书的最后一章，即“林彪的人生悲剧”。吴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林彪的人生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林彪的失败。吴先生从几个方面对此予以探讨：“民族主义情节——林彪的思想缺陷”、“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儒家——林彪的性格缺陷”、“政治与亲情——林彪的家庭缺陷”。这些则是以往史学家们研究探讨不多的问题，而这些探讨无疑对深入研究林彪本人以及其家庭与文革之间的关系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吴先生认为，林彪思维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人们不必苛责林彪的外逃行为，毕竟在大难临头之际谁都有权选择“走”还是“留”，林彪最后说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就意味了林不愿远走异国他乡，背上叛徒卖国贼的黑锅而永世不得翻身。吴先生认为，林彪在这个问题上远不如孙中山的目光更远大。不过笔者倒认为，孙中山当年流亡海外，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的封建王朝统治，是为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而奋斗；而林彪所面对的恰恰是他浴血奋斗所建立的他一心追求的共和国，所以，林彪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截然不同，其思想自然千差万别。林彪的“留”意味着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走”只不过步上王明、张国焘的后尘，只是这一走的代价实在太太大了，其惨烈的结局常让后人扼腕叹息不已。

吴先生认为林彪是个天才的军事家，但林却鄙夷理论，可同时又倾心于儒家学说。吴先生

认为林彪并未达到真正儒家的思想境界，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如周恩来。吴先生认为林彪身为天才的军事家，可是却无法成为政治家。吴先生的结论是，古往今来军事家从政者鲜有成功之例，而失败者却比比皆是。笔者认为吴先生这一见解虽然独到，但依然有可议之处。中国自古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军事家，但他们往往不能成为政治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的制度和体系，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往往神化自己，宣称君权神授，王朝的传递采世袭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骨髓，人民被要求忠君爱国，也就是忠于当今天子，效忠皇帝个人的朝廷，即便手握重兵的将军，也臣服于这套理论。想造反者大都是在王朝末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时，才给这一批人以可乘之机。但是一旦天下底定，新朝建立，军人们争夺天下的念头也就大都烟消云散。可是当权的皇帝却忧心于自身或后代王位的稳固，而常常大杀功臣，也是人们常说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也是那些优秀的军事家们无法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林彪的失败不是因为林彪缺乏理论或其儒家学说贯彻得不彻底，而是触及了毛泽东文革大业的底线。设想林彪如果依然秉持“主席画圈我画圈”而不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则林彪最终的结局一定会好得多，说不定在毛死后，林彪一挙粉碎“四人帮”，开启一个伟大的历史新时代。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后人只能对历史予以解释、分析，对今后的发展起到提示的作用。

吴先生还特别论及了林彪家庭的悲剧，也就是夫人操权，子女参政。这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涉及不多。其实这也是林彪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历史上历来忌讳“后宫”掌权，“后宫”掌权的结果往往造成外戚专权，朝纲大乱，最后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确，叶群在文革中夫贵妻荣，毫无尺寸之功却跻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实乃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大败笔。但细究其中之原委，还是毛泽东的主使，毛要将江青放到前台打冲锋，为江青开创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九届一中全会上叶群实是作为江青的陪衬而进入政治局，林彪虽然事前曾坚决反对，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叶群还是如愿以偿。与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叶群既缺乏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也缺乏眼光和实力。用文革研究者舒云女士之言“毛泽东对付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犹如老鹰抓小鸡”。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及之后的党内斗争中，叶群张皇失措，进退失据，面对毛泽东的步步紧逼，叶群完全乱了章法。原本应由林彪作主的事，叶群偏偏要自作聪明越俎代庖，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叶群及其子女介入党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是一败涂地，也使林彪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重的教训。

四、有所不足

上文谈及吴先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独到之处，下面再谈谈此书一些不足之处，就教于各位方家。

（1）吴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前前后后写了将近二十年。参考的书籍、杂志、文章，不是以几十篇上百篇计，而是几百篇上千篇。”既然吴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可是笔者在书中并未看到吴先生将别人的这些重要成果展示出来，换句话说，哪些成果是别人曾经论述清楚过的，而哪些是吴先生自己的，吴先生对此应该有所交代。吴先生虽然在“后记”里说：“这么冗长的篇名实在无法一一列在书后”，可是作为严肃的史学研究书籍，作者无论如何都在书中都应以介绍和说明，这样，该书才更有公信力。笔者并非要求吴先生事无巨细地罗列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但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上应该做到这一点。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研究的负责。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史家的基本常识。

（2）通观吴先生大作，全书没有给出任何注释，也就是说，书中几乎所有重要内容没有具体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众所周知，一部书的专业性、权威性源自于它所引用的资料是否可靠可信。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此书很难说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只能归结为非小说类的政治

性书籍，甚至有可能被划入“野史、戏说”的行列。吴先生自己在该书的内容简介中说“本书从全新的角度解析这个‘谜中谜’，展示大陆民间和海外研究‘林彪事件’三十多年来的最新成果，特别详尽地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秘密，并力图从‘林彪事件’透视毛泽东政治的内幕和本质”。显然吴先生是将自己的大作当成传世的学术著作来看待的。既然吴先生自言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上千篇文章和书籍，可为何在写作之中不将它们按学术的基本要求罗列出来？能做而未做实在令人感到惋惜，这就大大降低了此书的价值。由此，笔者感到作者似乎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此书到底应算历史演义还是史学论著？作者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若是历史演义，就还可以放开些写，若是史学论著，则应遵守学术规范。

（3）个别资料的来源殊为可疑，且未经证实，如此材料放在书中给人以不够严肃之感。比如该书在谈及毛泽东在获知林彪座机出逃苏联的确切消息后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骗了。”这段话出自坊间传闻且未经证实的姚文元的回忆——《回顾与反思》。可是，这个回忆从未见到当事人的认可，也未见于任何正式的书刊，充其量也就是姑且听之的坊间野史，作者在引用时应十分谨慎，不能被其哗众取宠的内容所迷惑。

（4）作者缺少对事件当事人的采访，全书写作全凭市面上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说“笔者无力获取档案中的第一手材料”。其实这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亦是一样，情有可原。但是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知情者，无论是林彪的家人、林办的秘书，还是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有很多还在世，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能够了解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这项工作相当艰巨，但是绝对值得去做。做到这一步的人自然对整体事件的了解和研究就会更加深入，诚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5）作者在某些问题上难免人云亦云。举例来说，研究历史之人应重实证而轻口供，作者与其他一些研究者有相似的问题。作者认为叶群参与了林立果的杀毛计划。然而，此说有何证据呢？唯一的证据就是林立果亲信李伟信的口供，声称叶群给林立果打了“抽鞭子”电话，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云云。叶群是否主使林立果去杀毛，全凭李伟信一个人的口供。单凭这么一个孤证能够坐实这个罪名吗？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只凭某个人的口供即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研究者对此不能不察。另外，吴先生也认为，林彪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殊不知这条罪名根本就是“9·13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给林彪凭空捏造的一项子虚乌有的罪名。读读迟泽厚先生的《卜占亚上下“贼船”记》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之处了。

（6）文革期间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于林彪有关，此书未曾涉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比如贺龙事件、老干部受迫害与林彪之关系、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等。另外，作者对文革之中的一些事情的描述和解释过于简单化，只看到其表面现象，而非其实质。比如作者对“杨余傅”事件的阐述就明显在状况之外，不了解其中的复杂内情。还有对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的倒台也不甚了了人云亦云。吴先生全书的题目是《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全书却没有一个对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总体评价，这也是笔者感到缺失之处。

五、一点感想

吴先生的著作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笔者还是认为此书有一定的价值。林彪其人以及林彪事件是文革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热点。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吴先生的著作对当前进一步深入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无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研究林彪事件，追寻历史的真相，这是所有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是历史的必然。真相一日不能大白于天下，追寻真相的努力则一日不停。文革史学者陈小雅女士曾云

“历史研究——作为一门追求‘历史原貌的再现’与‘公正诠释’的学问——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一日不得真相，一日追踪不止。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它的进程可能被延缓，它揭晓的时间会推到很远的将来，但这个时间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对林彪事件的研究屡有推进，从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到《重审林彪罪案》，再到吴先生这本《林彪与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这种追寻真相的努力之结果。

吴先生在没有“大内”档案资料和采访林彪事件当事人的情况下，依然能写出与官方大异其趣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实为一件不易之事。这也说明了，如果官方真的开放档案，允许当事人畅所欲言，允许研究者自由讨论研究，林彪事件何愁不真相大白呢？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林彪事件一定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的。

□ 原载《多维时报》2006年5月12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